

鲁山县税务局的“三反”运动

► 潘万发

1951年12月，中共鲁山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指示在县直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即“三反”运动。税务局是县“三反”运动重点单位之一，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任广厚坐阵领导。县局包括城关、张良、下汤、梁洼、瓦屋、灤河六个税务所共有干部75名，各税务所留28名干部坚持正常工作，其余47名全日制参加“三反”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至1952年9月结束，历经9个多月的曲折发展过程。

“打虎”初有成效

“三反”运动的重点是反贪污，也称“打虎”运动。上级规定个人贪污的数额在人民币一亿元以上者（人民币旧币一万元折人民币新币一元。旧币一亿元折新币一万元，下同）为大贪污犯，也叫“大老虎”；个人贪污的数额，在人民币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亿元者，为中贪污犯，也叫“中老虎”；个人贪污的数额，在人民币一千元以上不满五千元者，为小贪污犯，也叫“小老虎”；个人贪污的数额，在不满人民币一千元者，不定贪污犯，算贪污行为。党的方针是“彻底揭

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三反”开始，县委召开了县直干部大会，由县委书记冯智俊作“关于要雷厉风行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要求干部正确认识“三反”运动的重要意义，端正态度，积极参加“三反”斗争。税务局参加“三反”的干部，在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宫希仁带领下，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毛泽东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通过学习，干部认识到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糖衣炮弹攻击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查“三害”（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打老虎”。以个人坦白检查为主，检举、揭发、帮助相结合。初步检查有贪污多占的30多人，占干部总数的40%，退出赃款1300万元。其中个人贪污的数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只有闻彬（会计股长）1人，是税务局“三反”运动打住的第一个“老虎”。

严重违法乱纪现象

1952年2月下旬，县委召开干部大会，进一步部署“三反”运动，提出“大胆怀疑，猛打穷追”的口号，在县直机关迅速掀起以反贪污为主的“打虎”高潮。县委领导指出：税务局是征税单位，“林深虎多”。县委要求的“打虎”任务与税务局的干部思想认识相距甚远。一是认为税务局的干部多数是经党组织培训的青年干部，工作经验虽少，但比较清正

廉洁；二是虽有一些税务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犯有贪污错误，但大多数已坦白检查，积极退赃。县委领导把这种思想认识总结成为“思想老虎”，认为副局长宫希仁是为首的“思想老虎”。因而，宫的心情很沉闷，惶惶不安。有一天，机关开早饭时，宫愁眉苦脸的走到饭场，见同志们喜眉笑脸的聊天，强压心中怒气没吭声。当宫端着饭碗将走出饭场时，猛回头怒冲冲的说：“明天叫你们三笼格蒸馍剩下两格！”同志们不知所云，仍谈笑不止。果然，次日宫副局长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武装“打虎”队伍。并连续宣布金玉玺、魏兆禄、高中贵、韩振邦、张应时、靳永德、刘建业、周庆立、袁学彬、柴振学 11 人为“老虎”对象，占参加“三反”人员的 20% 以上。经数日逐人会战，金玉玺、魏兆禄等人，不承认自己有贪污行为，又没掌握真情实据，领导束手无策，运动进展迟缓。有一天上午，县委领导问部分“打虎”队员，“打虎”的打字是什么意思？有一名“打虎”队员回答：“打字是由一个提手一个人丁组成，象征一个人手里拿着棍子击打……。《水浒》中的武松打虎，不是武松用手里拿着棍子打死老虎，就是老虎吃掉武松。我们‘打虎’也要突出打字。”对“三反”的曲解，引致了严重违法乱纪现象。税务局 12 个“老虎”对象，个个用刑，6 人挨打，以致伤残。使用的刑具有：麻绳、木棍、木凳、手铐、脚镣等。用刑的方法是：罚跪、书本砸头、拳打、脚踢、绳捆、吊梁、戴手铐、脚镣、站三条腿凳子熬鹰、推磨（戴上脚镣、手铐在院转圈）、蹲“老虎笼”（一间小屋）等。还把农村一个小个体企业主揪到机关进行体罚、逼供对证。违法乱纪现象持续了 20 多天，偏离了运动发展方向，造成了不良后果。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逐人逐事查证落实

1952年4月初，中共许昌地委发现鲁山“三反”有严重违法乱纪现象，遂由地委副书记赵天锡、地委组织部长刘平带领地委工作组（组长王纯、副组长钱科长），来鲁山协助县委认真处理鲁山“三反”中的严重违法乱纪问题。采取的具体措施是：一、县委书记冯智俊离职回地委反省，县委领导班子进行整风；二、立即重新部署“三反”运动，制止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三、整顿积极分子队伍，总结经验教训，认识违法乱纪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逐人逐事查证落实。干群情绪趋以稳定。4月下旬至5月底，县委举办“三反”训练班，将积极分子和“老虎”对象（120多人）集中到县委党校学习，由县政府原建设科长孙彬（地委工作组组长）、公安局副局长尚铎奎具体领导。组建临时党支部。孙彬任支部书记，尚铎奎任支部副书记，李明仁、潘万发为支部委员。具体分两段进行：第一段，学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忆在旧社会受的苦难和在党培养下的成长史，结合受资产阶级腐蚀的党员和干部的错误事实，控诉资产阶级向党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罪行，提高参加训练班人员的政治觉悟。第二段，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逐人逐事查证落实。县委领导要求：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真的就说是真的，不要把真的说成假的；假的就说是假的，不要把假的说成是真的。按照上述原则，先由个人逐项写出材料，再由所在单位参加的工作人员负责逐项查证落实。

查证结果，没有一人可定为贪污分子（老虎）。税务局参加的11名“老虎”对象，经查证落实，柴振学（所长）、袁学彬（所长）、周庆立（副所长）、靳永德（副所长）、韩振邦、金玉玺、张应时、高中贵、刘建业等人的贪污问题，均予以否定。闻彬犯有贪污行为错误。按照党的政策，退出赃款，批评教育。凡属多占性质的，不以贪污论处，已退赔者，返退给本人。澄清了真假是非界限，纠正了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端正了态度，安定了人心，使“三反”运动得以顺利的发展。

思想建设结硕果

9月初，税务局按照县委的部署认真搞了“三反”运动后期党员和干部的思想建设工作。具体分四段进行：一、反复学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结合实际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学习和总结，肯定“三反”运动的成绩和意义，比较彻底地揭露了税务干部中存在的“三害”，基本上解决了贪污和浪费问题；打击了资产阶级思想，提高了税务干部抵御资产阶级腐蚀的能力，为清正廉洁征税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二、拆墙平沟。运动中发生的一些严重违法乱纪现象，在干部之间形成了一道高墙和鸿沟。在思想建设中，认真做了拆墙平沟工作，增强了干部团结。参与违法乱纪的同志，以诚相见，自觉作深刻的自我批评，并主动向受害的同志表示歉意。受害同志也主动表示，不咎既往，共同拆墙平沟，消除隔阂，增强团结。县委领导也带头总结经验教训，认为“三反”运动初期，违法乱

纪造成的内部伤害，是党领导工人阶级在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斗争中付出的代价，不是干部之间的个人恩怨，县委领导已经承担责任，要认真汲取深刻的教训。三、向党组织交心。在思想建设中，每个干部都把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和看法，无保留地说出来，向党组织交心。干部相互理解，党组织谅解，丢下包袱，轻装上阵。四、自我鉴定和小组鉴定。原则是实事求是，方法是在个人自我鉴定基础上，小组进行鉴定。基本上达到个人满意，干部满意，领导满意，思想建设结出了丰硕之果。9月下旬，县税务局“三反”运动胜利结束。

注：贪污：《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二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

我对“三反”运动的回忆

►程岷源

1951年冬，为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全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对国家机关内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对城市工商界）为内容的“三反”、“五反”运动。

党中央要求，要如同“镇反”一样，发动广大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这就使运动一开始就“火药味”很浓。毛主席亲批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之后，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

当时，我在县民主政府文教科工作。对鲁山县的“三反”运动，除因公外出未听取动员报告外，一直参加到底。通过回忆，现以政府机关的“三反”运动为主线，将运动的进展概况整理出来，以飨阅者。

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1952年9月结束，历时9个月。

根据县府大院的搞法，运动大体分五步进行。

一、全面发动，端正态度，提高认识。

二、开展自查，区分“清”“浊”。主动交待经济问题，当时叫“洗手”。自查中“没问题”和“问题不大”的人全部参加了机关的打“虎”（贪污分子）队。让问题大的听候审查。我因初到机关，过去又没搞过经济工作，没啥检查，三言两语就过了关。据说财粮组和已掌握的“重点对象”过关可并不容易。

三、大查深挖，缚“虎”追赃。依据外地经验，提出“山高有虎，林深虎大”、“大胆怀疑，放手揭挖”的指导方针。据前者，内定重点对象；据后者，放手发动群众，大胆检举揭发，力争除恶务尽。并通过自觉认罪、退赃立功，追讨催要等多种方法，力争尽可能挽回国家的经济损失。

四、查证落实，甄别定性。根据重点对象交待的问题，组织专人，内查外调，逐条进行落实，然后根据事实，定出错误性质，提出处理意见，最后按照组织手续定案。

五、总结表先，处理善后。1952年6月，张钦等18名“疑难人物”集中到县公安局机关大院。专案进行处理。至此，运动进入总结、善后阶段。

这次运动，由于县委领导的主观因素，使运动一开始就走了弯路，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大胆怀疑，抓“老虎”宁错勿漏。把搞过经济工作的人员几乎全列为怀疑对象。原县府工商科科长李玉玺被当成重点；县府已调出的前两任总务王化民、郑云祥，调回机关交待问题；就连为机关赶大车的车把式宋老头也从外地找回来进行清算，对已被开除回家的人申瑞旺、冯俊岭、补瑞亭、张理平、苏玉琛、白同玉等，全被抓回来重审。

二、刑讯逼供。运动中使用过10种刑罚：捆、吊、打、跪、轧、跑（带镣跑步）、镣、铐、站、绊（铁丝系住脚脖，只能蹦，不能走）。另外还设有禁闭室、临时看守所等。

逼供的办法有：①小组逼供，群起围攻。②专案分工，专人包干。按单位、按错误性质分为“铁案”、“粮案”、“综合杂案”等专案。专案组又定人包干，主攻。我和杨廷昭就包打过孙忠恕，不到半天，就把孙打成了贪污亿元（老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币一元）以上的“老虎”。后经落实，全属乌有。③大会示范，杀鸡警猴。县司法科主持在县府后院召开揭批王化民大会，五十名“老虎”对象列席参加。会上让王光腿

跪石条和上轧杆。财政科的“老虎”对象韦麟三怕整，当场承认贪污粮食 27 万斤（实际是四人合伙贪污小麦 4000 斤）。还把张官营粮库副主任刘自成当做顽固典型，县委冯智俊书记亲自在县直干部大会上宣布，把刘“当场逮捕，上镣入狱”。在县中院组织“老虎”展览会，把县中的总务主任梅应瑞和刘自成上脚镣，打花脸，当展品，让人参观，以儆效尤。④亲人说服动员。“铁案”主犯王立堂“顽固不化”。专案人员把他的爱人刘××叫到机关，经过“培养”，让其“揭发”丈夫的“罪行”，并“说服”丈夫低头认罪。事迹在河南日报上登出来。真象大白之后，撰稿人禹××还在《通讯业务》上受过批评。⑤集中“老虎”，游街示众。

三、封门抄家，逼对象退脏。

办法有五种：

1、小组追逼。文卫组在追脏中，组长李××对郑云祥的追脏方法是：问如何退脏，不说就捆起来或吊上门墙；所答非所问就脚踢，用劈柴、木棒敲打。实在打得受不了，郑说：“脏款我保证退。”“如何退法？”郑回答：“我家地里有个老煤窑口。等孩子长大了，下去掏煤退脏。”

2、上门催讨。我和马文玉、曹孔曾等专案人员曾带着“老虎”去张良区催脏。引门照户，见啥拿啥，查点家俱。封了汤××家的门，拉了×××家的牛，在孙忠恕家实在没啥拿，收了七条半截口袋。

3、听风是雨，顺藤摸瓜。财政科韦××说脏款大部支援家居宝丰境的姑母和一位要好的老仁伯（父亲的好友）了，我被迫闻风而上，结果完全失实。

4、政策攻心。我当时是攻心组成员之一，天天到临时看守所进行政策攻心，启发教育对象。其结果，除对象熟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退出脏款，检举别人，立功赎罪”之外，别无所获。

5、大会示范，县政府主持召开退脏大会。张理军把家中的一匹马牵到会上抵脏。当场宣布，张退脏积极，认罪态度好，不戴贪污分子帽子，免于刑事除分。会上虽多人表示退脏，但会后很少有人落实。

这次运动，曾引起社会上一片混乱。机关内人人自危。有个财务干部曾说：“我的子子孙孙，宁让他们拉棍要饭，也不让他们干财务工作了。”

运动中的过激做法，使“三反”范围扩大化，造成了大批冤错假案，产生了许多所谓“非虎”。对此，许昌地委极为重视，派出钱××、王纯、孙彬等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前来鲁山检查纠偏。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①县委冯智俊书记调离鲁山，其他主要责任者深刻检查。②召开县直干部大会，澄清思想认识，端正运动方向。③孙彬同志亲自主持，开办“三反”训练班。

“三反”训练班主要办了五件事：一是重新武装骨干，端正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二是提前处理“非虎”。三是让受过过激之害的人员，面对面向打虎队员提批评建议，交流思想，恢复感情。四是控诉资产阶级罪行，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组织各种类型的诉苦会，进行阶级教育。五是实事求是，查证落实，提出处理建议。

在控诉会上，县总工会主席李天锁同志痛哭流涕地检查：“我民国十八年入党并参加工作，阶级觉悟不高，政治立场模糊，被糖衣炮弹打中，腐化堕落，经济乱支乱用，犯了严重错误。”越说越痛，一口气上不来，当场昏厥。县人民银行股长李××，在控诉会上顿足捶胸，自恨被资产阶级的“糖弹”击昏，当了俘虏，今后要坚决划清界限。

训练班从夏到秋，后又开了总结表模大会和三反后期思想建设大会。至此，“三反”运动始告结束。

鲁山土改试点在我村

►林瑞五

1949年秋后，县土改工作队一行五人（老邢、老郑、老侯、李中甫、王宗岑），进驻我们小庄村，分别住在刘天河、陈东岐、张运生家。他们为房东挑水扫地整理院落，和群众拉家常访贫问苦，一日三餐分户吃饭，饭后当即付钱。在访贫问苦、宣传贯彻土改政策中，发动农民加入农会。农会会员条件是：历史清白根子正，不当狗腿敢斗争。即旧社会没给反动政权干过事，是贫苦农民，并且敢于向地主作斗争。土改政策是：中农不动两头平。即具有土地自种自食者为中农，土地财产不动；依靠土地剥削者为地主，没收其全部土地和财产；剥削量在25%以上不超过30%的为富农，征收其多余的土地和财产，把没收和征收的土地及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基本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

我村是一个贫困村，当时居民62户，296人。共有耕地750亩，其中外仓房（地主在外村地在小庄）占地310亩，包括城内祥发原占地90亩，广义堂占地30亩，詹营彭相连占地25亩，石虎沟一户占地24亩，袁寨李明树占地40亩，大王庄永生恒占地50亩，葛条岭李家占地50亩。本村地主赵建行和赵五疯子共有地200余亩，张世学40多亩，林董氏40多亩，四户富农都是20多亩，中农都是10亩左右。贫苦农民有地三二亩者占总户数的一半左右，他们全靠租种地主土

地生活，吃不饱穿不暖极为贫穷。村上贫穷户多，单身汉多，借高利贷者多，缺儿少女者多，信神拜佛者多，游手好闲者多，生活富裕者少。

通过一个多月政策的宣传贯彻，绝大部分农民认识到，土地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地主的土地是剥削农民得来的，打倒地主平分土地是土地回老家。农民加入农会的就有 80 余名，同时还发展刘天河、陈东岐、张运生三个党员，发展林克一、林枝、刘自苑三个新青团员，使他们成为农会的骨干力量，并选举陈东岐为农会主席。

在工作队和农会的领导下，开始大算帐（算各家各户的剥削帐和被剥削帐及放借高利贷帐），大对比（比各家各户的收入），按收入划阶级成分，三榜定案。把赵建行、赵五疯子、张世学、林董氏 4 户定为地主，划定富农 4 户，富裕中农 2 户，中农 5 户，佃中农 1 户，贫农、赤贫 44 户，雇农 2 户。其中林明一，1946 年当保长，工作队认为他有土地剥削，当保长还剥削，应划为地主。呈请上级批示，定为富农，理由是，土地剥削是成份，当保长是历史。

定了成份以后，便开始分地。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外仓房不论成份，土地全部归村，并通知有地户，想分地就迁来，不论成份，每人一份；不来就在所在地参加土改分地。广义堂（赵永和）就迁来 4 口人参加土改，分地 4 份。当时把全部土地分为金、银、铜、铁四类，中农户除自己原有土地外搭配够平均数，其他按类均分，一人一份。

在分地的同时，分配胜利果实。把没收的地主财产和征收富农的多余财产作为胜利果实，按物定价定份，再把应分

县政协为程岷源赠匾

▼李学乾

在 1993 年 5 月 7 日的第十次文史工作会议上，县政协举行了为优秀文史资料员程岷源先生赠匾仪式。

程岷源先生是水利局离休干部，1979 年患贲门癌。14 年来，程先生以顽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与病魔抗争，硬是伏床撰写了 35 篇计 15 万字的历史稿件，为我县文史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5 月 7 日上午，赠匾仪式在县委礼堂举行，鞭炮国乐声中，中共鲁山县委副书记陶洪臻、县政协主席杨锦领亲手将书有“沉疴撰史光前裕后”的金色大匾赠给程岷源先生，然后由乐队送行，陶书记、杨主席率领，出动五辆汽车，将大匾送往程先生住处（县水利局家属院）。

这次会议还表彰了其他 23 名优秀文史工作者，并对今后的工作做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

果实的人口，应得份数等通知到各户。雇农、赤贫、贫农，依次登记造册，由各家各户按先后次序挑选实物。有选中箱子的，有选中柜子的，有选中桌子的，他们都很高兴。赤贫程茂林选中一个风箱像得到一件宝物那样喜悦。

农民分到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都在提高产量上下功夫，拾粪的拾粪，铲沫子的铲沫子，养牛的养牛，喂羊的喂羊，甚至连一点儿屎尿也舍不得失去，把粪送到地里，使粮食逐年丰收，再也不过那种糠菜半年粮的苦难生活了。

鲁山抗日之战

►尹崇智

1944年5月6日，侵华日军十二军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由叶县攻占宝丰后，部分兵力经瀍阳、徐营西进至辛集；主力经瀍阳、水车园西进至小河张，将国民革命军九十二军四十三师1000余人包围在露山坡。同日，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二二六联队泽野大队、山炮兵第五中队、无线电第一分队，由襄县攻击宝丰，击溃国民革命军十三军八十一师3000余人后，也侵入鲁山县境，于当晚20时30分达辛集，归独立混成第七旅团指挥。22时，日军向露山坡发起攻击。四十三师无能抗击，突围向西南溃逃。7日8时30分，日军第七旅团侵占鲁山县城；10时，泽野大队进至城郊，14时30分占领城北赵庄。

5月10日前后，国民革命军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为收复失地和阻止日军进犯豫西南，挺进伏牛山东麓。

5月15日前后，六十八军三十六师、一一九师进至鲁山，一部沿下汤、四棵树、南召县李青店一线设防；一部沿熊背、黄土岭、交口一线设防。5月19日前后，该部于黄土岭、交口一线，凭仗有利地形，在飞机的配合下，对南侵日军给予沉重打击，致使敌缩回县城。5月23日7时，三十六师攻克县城西关，接着又几次向城内攻击，未能得手。5月23日12

时，日军从宝丰增援鲁山战车 16 辆、步骑兵 500 余人，从侧翼向三十六师进攻，该师被迫撤出战斗。

5 月 26 日，五十五军进至鲁山县东南部。27 日，该军二十九师驻杨村、肖营；七十四师驻张良。

5 月 27 日 7 时，七十四师二二〇团三营，于辛集一带截断鲁宝交通，加强连推进到露山坡。一、二营于 12 时向日军侵占的濉阳街发起攻击。驻濉阳的百余名日兵利用民房顽抗。激战约 3 小时，敌向宝丰县城溃逃。此战，日军伤亡 20 多人；一、二营伤亡 14 人。29 日 3 时，一、二营向驻守宝丰县城南关一带的日军发起攻击，于拂晓占领东关、南关。7 时许，日军从郟县支援宝丰汽车 25 辆，载兵 700 余人，向一、二营侧背围击，城内日军又发起反攻。一、二营三面受敌，于 30 日黄昏被迫撤至鲁山县张良西北一带。进占辛集的三营，于 29 日 11 时，与由鲁山县城增援宝丰的 300 余日兵发生战斗，阻击日军于辛集南一带，把敌压缩在一块凹地。下午 4 时，日军增兵 300 余人，从侧翼向三营进攻。三营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到 30 日 2 时，撤至东羊石。6 月 1 日，二二〇团、二二二团集结于张良西北部。6 月 2 日，二二〇团一营占据马楼、释寺、贾集；二营占据杨庄、双柳树；三营占据仓房庄；二二二团占据老将庄、良西庄、大赵楼、小程庄、大程庄。

6 月 3 日晨，日军步兵、骑兵 500 余人，带 4 门小炮、4 辆战车，从鲁山县城出发，向东南方进犯，至绰楼村遭二二〇团前哨连阻击。日军在战车的掩护下，迅速突破前哨连防线，接着以猛烈炮火向二二〇团一营防守的释寺、马楼、贾集阵地轰击，用战车开路，掩护步兵、骑兵进攻。一营顽强

战斗，与日军反复冲杀 10 余次。午时，日军突破一营防线，攻进马楼、释寺、贾集。一营官兵浴血反击，与日军展开巷战。在马楼韩家大院，一营一连在连长李铭州的指挥下，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毙敌 40 余人，李铭州等 31 名勇士为国捐躯。与此同时，另一股日军由高崖头渡河，向仓房庄、杨庄、双柳树二营、三营阵地发起攻击。当这一股日军闻知马楼一带战况激烈后，仅留小部分兵力牵制二、三营，大部分兵力增援马楼。下午 4 时许，二二二团由老将庄、小程庄、大程庄迂回向马楼、释寺、贾集的日军侧翼进攻。日军不支，逃往县城。6 月 4 日，五十五军撤至西南部山区；鲁山县平原地区全部被日军控制。

我对滇缅远征的回忆

► 朱治兴口述 程岷源整理

我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名老兵。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在陆军 166 师任上尉连长。从 1938 年 2 月开始，我先后在豫北、晋南与日军作战达四年之久。1944 年元月，又参加了中国赴缅远征军，在滇缅边界对日作战，直至 1945 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现将远征概况追记如下。

一、出 征

抗战后期，为了配合盟军（美国参战部队）作战，保护我国唯一尚存的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国民党政府于 1942 年 3 月向缅派出了远征军。远征军司令长官初由杜聿明代理，旋派罗卓英担任，1943 年 4 月，蒋介石改用陈诚，同年深秋，又由卫立煌接充。长官部始驻云南楚雄，卫到任不久，为便于指挥，移驻距怒江前线仅 70 公里的保山县马五屯。

1942 年底，日军渡边正夫的 56 师团从缅甸侵入我国云南边境，侵占了滇西的畹町、芒市、腾冲、龙陵，直抵怒江边，占据了滇缅公路咽喉——怒江上的惠通桥。唯一的国际通道被切断，号称安全大后方的云南省人心惶惶。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后方部队，每师挑选一个精兵营，陆续调赴滇缅前线，充实远征军力，保卫大西南安全。